边疆民族

论康熙末年清军两次入藏的战略选择

赵　珍

[**摘要**] 康熙末年，清朝以逐准噶尔部出西藏为契机，先后两次派兵入藏。第一次是纯粹军事意义上的行动，结果将亡兵败。第二次入藏取胜归于争夺民心政治战的功绩，与康熙帝正确审视政治环境、内外政治因素，利用卫拉特蒙古内部矛盾，区分蒙、藏民族关系等政治策略选择有极其密切的关系。康熙帝充分利用青海蒙古的军事力量和在藏的政治影响力，以“恢复你祖道法”为承诺，册封郡王等手段，拢得民心，使其出兵助战。同时，以从政治上取得优势为着眼点，册封塔尔寺灵童，树立达赖喇嘛这面宗教旗帜，大力争得蒙藏民众的支持，最大限度的孤立、瓦解准噶尔部在藏势力，为顺利入藏的决定因素。值得注意的是，在充分利用青海蒙古的过程中，康熙帝对西藏问题的认识也经历了一个转变，直到最后的取而代之，实现对西藏的直接管理。

[**关键词**] 康熙末年　两次入藏　战略选择
[**中图分类号**] K24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 - 8587 (2002) 04 - 0094 - 10

On the Strategic Decisions of the Qing Army to Enter Tibet Twice during the Late Kangxi Period

In an effort to drive the Zungars out of the region, the Qing Government twice sent armies to Tibet during the closing years of Kangxi reign. After the failure of the first effort the Kangxi emperor learned some valuable lessons. At the time of the second march Kangxi took advantage of the power of Qinghai Mongolia and their political influence in Tibet, and obtained their assistance. At the same time, Emperor Kangxi employed political measures, such as supporting the Dalai Lama in Kumbum Monastery and obtaining the support of Mongolian and Tibetan people. Together these measures allowed the Qing to isolate and undermine Zungar power in Tibet thoroughly. Entering Tibet with local support resulted in the Emperor Kangxi achieving direct control over Tibet.

十八世纪前半叶是西藏政治史上的多事之秋，因而倍受史家关注。这一时期西藏经历了一系列政治动荡，最终结果则是和硕特蒙古在西藏统治的终结和清廷直接治理西藏。就清朝方面来说，实现这一转变的关键是康熙末年清军的两次入藏行动，也就是一般学界常说的“驱准保藏”之役。关于清廷的两次出兵西藏，虽然许多关于西藏史的论著每每提到，但多以《实录》为纲论述，且多集中谈第二次入藏。将两次入藏行动联系起来，探讨这一时期清廷对西藏战略转变及其影响，无疑有助于深入研究当时错综复杂的清廷、青海蒙古、准噶尔、拉藏汗和西藏政教上层之关系，对当时清朝的西藏政策给出更合理的解释。

一、准军入藏以前清朝的政策

准军侵藏以前（1717 年前），总体看来，清朝对西藏的政策是积极的，稳步前进的。政策主旨以逐渐加强清廷在西藏僧俗两界的政治

[**收稿日期**] 2001 - 10 - 10
[**作者简介**] 赵珍 (1962 —)，女，中国人民大学人文学院清史研究所博士生，副教授；北京 100872

影响力为主。这一政策的目标除稳定青藏高原政局外，还可赢得众多的黄教徒——蒙古民众的爱戴，在保护喀尔喀蒙古、与噶尔丹的争夺中处于有利地位。

但是，五世达赖喇嘛圆寂（1682）以后，西藏政局内部还是暗流汹涌。先是第巴桑结嘉措匿丧，并由此导致来自清朝的信任危机。接着是仓央嘉措的坐床引发的准噶尔和拉藏对其合法性的怀疑。然后是拉藏汗与第巴桑结嘉措的争权，第巴被杀。接踵而来的是拉藏汗废仓央嘉措，遣送北京，死于中途。拉藏汗另立益西嘉措。由此导致青藏分裂，青海蒙古另立格桑嘉措相抗衡。其时，清朝由于不明西藏政情，政策呈现出波动性。先是为稳定藏政，被迫承认仓央嘉措，又出于对第巴的不信任，转而扶持拉藏汗，反对第巴。并否定仓央嘉措的合法性，令拘送北京，并承认益西嘉措，此举不仅引起青海台吉的反对，也开罪藏内拉藏汗的反对派，并促使二者合流，共同对抗拉藏汗和清朝。除西藏两派（拉藏汗与第巴）、青海两派（左翼和右翼）围绕真假达赖的矛盾冲突外，远在新疆的策妄阿喇布坦也在密切关注事态发展，和青藏双方都保持着使者往还联系。局面更加复杂。

主要的矛盾是以达什巴图尔、察罕丹津为首的青海右翼与拉藏汗的矛盾。拉藏汗以清廷为后援，坚持立益西嘉措，清廷在短暂犹豫之后，于康熙四十九年（1710）给予册印，诏封第六世达赖喇嘛。[①]此举激怒青海诸台吉，他们坚持理塘格桑嘉措为真正转世，并将其迎至理塘寺。[②]康熙五十二年（1713）九月，达什巴图尔、察罕丹津上奏清廷，理塘寻得真达赖喇嘛，要求迎至青海。[③]清廷遣使青海，要求将理塘灵童携来北京验看后再定，遭到青海方面拒绝。同时遣使拉藏汗，要求拉藏汗报告益西嘉措寻得情形。在得到拉藏汗和班禅的肯定答复后会盟青海，谕令将格桑嘉措移居内地。青海台吉以避痘等理由“卒不遣”，双方调兵遣将，几至武力冲突，后双方让步，以将格桑嘉措安置在塔尔寺告终。[④]

至此，清朝的西藏政策面临两难处境，继续支持拉藏汗，将会失去青海的稳定；放弃拉藏汗，则会引起西藏的动荡，两者都是清朝不愿看到的。比较而言，清朝当时更需要青海的稳定。康熙五十三年（1714）二月，策妄阿喇布坦兵侵哈密，清廷首先想到的是准噶尔部可能会入侵青海，于是一面还击，一面遣使青海，布置青海左翼防备准军。[⑤]这一行动，证实清廷政策的出发点是青海。

二、准军入藏：清朝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

康熙五十四至五十六年（1715—1717），清廷的注意力集中在哈密方面。康熙五十四年（1715）五月，在哈密之战后两个多月，清廷遣使准部，一方面问罪，一方面索要被扣留的拉藏汗之子。同时令新疆方面“两路兴兵，扼要驻扎”，做大举进攻的准备工作。[⑥]同时清廷方面正在派官主持以呼毕勒罕为议题的青海台吉会盟，压服青海右翼交出理塘灵童格桑嘉措。因此，康熙推测，察罕丹津不肯交出灵童，“盖因将此呼毕勒罕西送，可图拉藏汗，期以互援。不可谓未与策妄阿喇布坦商议”。[⑦]策妄果然插手青藏问题。清廷期望来年平定策妄，“俟策妄喇布坦之事定时，或许呼毕勒罕事，青海诸事俱可定矣”。康熙五十五年（1716）三月，清廷派往准部的使者返回。策妄以谕旨系部文为由，要求清廷重新遣使会商。清廷虽然愤怒，但进兵尚未准备充分，只得再次向准部遣使，同时计划“明年草发时进剿。”[⑧]由于拉藏汗的不得人心，也为了笼住青海台吉，是年五月，康熙帝正式表示理塘灵童“汝为前辈达赖喇嘛的真正转生，朕与护教法之后裔皆为施主”。[⑨]但同时不主张迎请入藏。这样就把灵童控制在自己手中，为将来预留地步。是年十月初六，策妄再次出击偷袭清军前线察罕乌苏马群，清军三路备防，重点放在噶斯一线，防其“由噶斯大举进犯青海，以克西边。”[⑩]康熙五十六年（1717）四月清廷授予富宁安靖逆将军，准备进攻。五、六月间，清军分三路攻击策妄，大获准部马驼牛羊，踏平其耕田，准军溃散逃遁。清军遂于七月二十一日班师。[⑪]然而，就在清军展开攻击后，清廷却收到了来自西藏达赖喇嘛和班禅的请求清军班师，停止对策妄攻击的呈文，康熙帝深感狐疑

"不知其意何在？"[12]清廷逐渐意识到，青海、准噶尔、拉藏汗三方关系远比自己所掌握的情况要复杂得多。

康熙五十六年（1717）七月，就在拉藏汗的统治已经稳定下来，清准冲突也已告一段落、一切都将趋于平静之际，一场规模更大、更严重的危机爆发了——准噶尔的军队出现在西藏的地平线上，清朝的西藏政策面临着更加严峻的考验。

是年六月二十九日，准军出现在西藏纳克产地区（今申扎），由策凌敦多布为首的五名宰桑（阿喇木扎巴吹木伯勒、托布齐、喀喇沁都噶尔、萨音查克）率领，共有精兵五六千人，号称万兵。他们打着送归拉藏汗长子噶尔丹丹衷的旗号。实际上是针对拉藏汗而来，"因拉藏汗与阿穆呼朗汗为一统，我台吉拨我等万军征讨……我等惟征拉藏汗而已，无侵尔众唐古特之处。"[13]

准军的突然出现令毫无精神准备的拉藏汗措手不及。消息被证实后，拉藏汗与幼子苏尔扎急忙在达木布防，同时遣使向青海左翼诸台吉和清廷驻西宁官员通报敌情。

八月十二、十四日两路使者都已达西宁，此时，来自新疆前线富宁安的消息也证实一支准军由阿里进入西藏。八月二十五日消息到达北京。由于事变突然，情况复杂，尽管面对拉藏汗的告急文书，清廷决定采取暂不卷入、静观事态、以防御准军入青海为主的策略。

首先要弄清准军入藏是为了援助拉藏汗还是消灭拉藏汗。因为来自富宁安的消息只证实了准军入藏，至于"或征伐拉藏，或往援拉藏之处，未得明晓。"[14]而来自青海左翼、右翼台吉使臣的消息又不相同。左翼台吉使臣带来台吉达颜、色布腾扎勒的意见是"亲王罗卜藏丹津、贝勒察罕丹津等与拉藏汗甚恶"，但与策妄阿喇布坦关系密切，而右翼纳木扎勒色布腾、亲王罗卜藏丹津处来的消息则说，噶尔丹丹衷本人、属下人已被杀，"拉藏汗，唐古特众闻后，怀异心不可料定，故而隐匿。"[15]在策妄出兵西藏目的未弄清之前，清朝驻西宁官员只能采取以下措施：其一，规劝青海左右翼台吉"停止互相猜疑，一心一意互相援助，和睦相处。"其二，各自立刻备兵，探听消息，听候清廷进一步指令。其三，对拉藏汗，鼓励士气，"以尔等兵力击之，易于成功。"其四，西宁清军，"现尚未有确讯，见敌情之前，不可冒然发兵，惊扰众人。"[16]

是年十月，来自各方的消息已经证实，准军是为征讨拉藏汗而来的。如何援助拉藏汗就成了清朝方面首先考虑的问题。清廷在综合了各方面情况后，决定按照康熙帝"我军为护佑青海民众备战"的指导思想，调兵遣将，全面加强青海防备。特别提出"西宁地方重要，且有小活佛"。总之，这一时期清朝在战略上采取的是积极防御，对西藏则明确提出："我军虽欲援拉藏，而地方遥远不可援。"[17]但仍然要求调赴西宁官员做两手准备，"今拉藏若能败策妄阿喇布坦之兵，信到，即可调回尔等。倘拉藏被策妄阿喇布坦所败，尔等即与青海台吉等协力征讨。"[18]当然清朝也不希望拉藏战败，因此积极说服动员他的青海兄弟们出兵援助，并特别指示："额伦特、公策妄诺尔布等，集青海之台吉等，开诚晓谕：黄教、图伯特民俱固始汗所创者，断不可被他人所占领，尔等俱固始汗之子孙，理应各自速往援助。尔等若往，既然我等大军俱陈边外，专守卫尔等牧场，尔等毫不必为牧场、妻孥挂念。"[19]"著青海台吉等速行领兵前往。"[20]此时，康熙帝对西藏局势仍持乐观态度，"此事尚在好转"，因此判断准军要么原路返回，要么改走噶斯路撤退，甚至可能归降清朝。

可以说，一直到十一月，清朝的战略重点依然放在新疆，"故复议明岁三、四月出兵。"[21]但是，西藏形势发展之迅速，特别是其结果远远出乎清廷的意料，八到十月，拉藏汗与准军在达木附近对峙近两个月后，退守拉萨。由于指挥上的失误，也由于手下大臣的叛变，拉藏汗于十一月初一日兵败被杀，子苏尔扎被俘。苏尔扎之妻携少数人逃往青海。但是由于距离过于遥远，清廷对此全然不晓。拉藏汗死前最后一封告急文书到达北京已经是康熙五十七年（1718）二月。面对拉藏汗"速发救兵并青海之兵"的恳求，清廷意识到问题的严重，决定出兵援救。由色楞等选拔满洲兵二百、绿旗兵二百，土司兵一千，青海王、台吉等派兵六千，"商酌行事。"[22]清廷的决定表明，

以拉藏汗的败亡为关节点，清朝的西藏政策开始改弦更张，由原来的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即协助青海蒙古恢复西藏。所谓“救援西藏”。两天以后，清廷得到拉藏汗“阵亡之信”，同时传闻策妄阿喇布坦将移往西藏，康熙帝打算“即令色楞统率军兵征剿西藏”，而新疆方面“本年暂停进剿。”[23]西藏替代新疆上升为清廷的战略着重点。

此后清军的部署都是围绕具体实施进军西藏战略展开的。是年三月，色楞手中已有二千六百名兵丁。同时，原定作为色楞后援的总督额伦特提出两路进藏设想：色楞率军与青海之兵从一路前进，额伦特率西宁之兵及唐古特兵从另一路前进。清廷对此方案未置可否，只要求驻西宁诸大臣“理应会商妥协”，“定议举行”。[24]在调兵同时，令四川总督年羹尧负责督运粮草军需。

是年五月初康熙帝策划了另一方案，由额伦特实施“奉旨差渣布（扎卜）往察罕丹津处，令遣人将准噶尔之兵诱来。俟所遣之人回信，然后进兵。”接着又把察罕丹津调往京城入觐。但这一计划没有下文，四川方面却接到了准噶尔军五百名出现在察木多（昌都）并与察罕丹津所遣宰桑暗自通谋消息。清朝决定利用塔尔寺灵童的威望，以“圣主保护胡必尔汗之本乡”名义，接管里塘、巴塘，“便为川省要隘。”[25]

“遣使诱准”的计划事实上已经流产。驻守在巴颜喀喇的色楞得到额伦特关于上述计划的咨文后，一边向木鲁斯乌苏移动，一边等候消息。五月十三日抵达木鲁斯乌苏。侦知此处距准噶尔的哨所不过五百里。在这里，色楞向康熙帝上一长篇密奏，提出“不候额伦特而进攻”的请求。

奏折中色楞首先谈了对“遣使诱准”计划的看法。“策妄喇布坦（即策妄阿喇布坦—引者）、察罕丹津互约，征伐拉藏，立小呼毕勒罕，以察罕丹津为首驻扎之事，虽不稔知真伪，现所传布之语，不可谓甚无征象。今察罕丹津遣使，伊等内果真有约定之事，务据实相告”。“现无达赖喇嘛，击败准噶尔兵遣返，招地空虚，我等大臣既然与察罕丹津互有盟约，俟小呼毕勒罕坐床，青海民众、诸土伯特、唐古特俱赖察罕丹津、策妄喇布坦之力，以树黄教”。在常理看来，策妄阿喇布坦功在消灭了拉藏汗，废黜了假达赖；察罕丹津功在赶走了准噶尔，扶立了新达赖，青、藏民众感激的是此二人。清朝方面则没有尺寸之功。潜台词就是不宜等察罕丹津的诱敌计划，也不必等候青海蒙古兵的到来。

其次，色楞对自己身处的形势作了分析。清军方面有如下优势：一是兵强马壮粮足，有二千六百余兵。二是得民心，是仁义之师，西藏各族民众“每日向东仰望，期盼圣主文殊师利皇帝拯救”。三是战术稳妥。“防之加防，慎之加慎，牢固营房，严守哨所，缓慢进入，仰赖主子之天威，务必剿决。”[26]而准噶尔兵力虽有四千，但“分散驻扎，且无法纪，凭借夜深骚扰盗马外，无他本领。”[27]色楞认为“此机断不可失。”如按原定计划，驻军等待额伦特部汇合，则面临缺粮无水、兵丁懈怠等一系列困难。因此色楞力主抓住时机，“众官兵正值奋勇，士气高涨”，“一旦深入，请惟抵西地，剿杀准噶尔贼，复取招地，功可告成。”并向康熙展望了一幅截然不同于前一计划的诱人图景：“如此克复西招后，圣主为众生灵安生，颁下英明谕旨，复立黄教，再兴佛门，青海、诸土伯特、唐古特民众诚心诚意永远祷祝圣主拯救慈爱全体生灵之恩惠，使之再生。策妄喇布坦闻后，授首。”[28]显然，康熙更期盼的是后一种结果。康熙帝接到奏折后，立即表示“此奏好事”。议政大臣们也完全赞同，“色楞乘机即急速率兵进剿之处，甚属可嘉。”同时令“额伦特亲率兵急促尾随策楞（即色楞——引者）之军进攻。”攻克西藏后，“留我军千余，青海等千余，镇守招地，余兵即应撤回。”[29]康熙帝批示：“依议，速行。”

至此，救援西藏的重大行动，直接简化成了一次孤军深入的军事冒险。

康熙帝一改多年养成的稳健、持重作风，同意孤军深入，与他对准噶尔实力估计严重不足有关。他还沉浸在哈密之战“以二百余人，败其二千余人”的喜悦之中，甚至夸下海口，认为即使进攻其老巢伊犁，“兵亦不用多，二百余人便可破之矣。”[30]西藏准军在他看来已是疲敝之师，人数不足二千。[31]而今色楞有二千

六百精兵，且有额伦特的后援，应该是马到功成。为了配合此次行动，清朝专门向西藏僧俗发布告示，宣称“我圣主真正为佛教大施主，不忍闻此情，即发派边界地方数千大军陆续随往，务取招地，复遣大军，与青海之军同往取招。”[32]同时遣使致书策妄：“本年五月我大军一万，青海兵二万，整饬兵力，起程前往拯救西招，今日想必已到。拯救招地后，我军将竟驻守招地。”[33]由此可以概见康熙帝的踌躇满志。康熙帝甚至设想了平定西藏后的善后方案。

但是，等待他的却是一场前所未有的惨败。这次战役历史上称为哈喇乌苏（黑河）之役，从七月持续到九月末，计四个月时间（是年闰八月）。

此战清军损失惨重，两员大将一人阵亡，一人被俘。兵员损失，按清廷方面说法是一千五百余人。此外，被俘入藏 428 人（后被遣归），还有一批人被当即释放，遣归青海。哈喇乌苏之役，是清朝立国近百年来从未有过的惨败，消息传到北京，朝野惊骇之余，深感耻辱。对被俘遣送回的官兵，廷臣甚至主张“为官者即行查明正法，为兵丁者，各送回原籍”。对此康熙帝坚决反对，“此次进剿官兵，有功而无罪耳”。[34]同时全力做好善后抚恤事宜，令派往西宁的抚远大将军胤祯，“查明西路兵阵亡、病殁人等，著大将军王即行赏赐”。同时命胤祯亲自前往吊唁额伦特；为阵亡官兵大做道场，胤祯总为奠酒。[35]康熙帝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承担了失败的责任。

此次进兵西藏失败有许多具体原因。康熙帝将其归结为“不晓天时地利所致”。“春季青草萌发，夏秋草变黄，马畜渐瘦，送粮路山梁被雪阻截，且冬季瘴气益烈，人不得食，始冻，全身肿胀即亡”。[36]此外还有色楞、额伦特两将不和，不能协同作战；策旺诺尔布后援迟滞，粮饷不继等等。但 最重要、最根本的原因恐怕是清朝“救援西藏”的行动目标没有得到青海蒙古和西藏民众的理解和呼应。青海蒙古、特别是右翼首领真正关心的是能否填补拉藏汗的位置，恢复顾实汗的道统，继续做西藏的护教法王。在清朝没有做出这样的承诺之前，他们不会派一兵一卒，甚至可能还对清朝的入藏行动抱抵触情绪。西藏僧俗民众盼望的是真正的呼毕勒罕返回拉萨坐床，使他们的精神有所皈依。他们反对准噶尔，也主要是因为准军对宗教的损害和不敬。在入藏清军没有举起“护送达赖进藏坐床”这面旗帜之前，他们只会无动于衷。

三、胤祯（即胤禵）西征：一场成功的政治攻势

喀喇乌苏之战是清朝西藏战略调整的又一个标志，此后清廷由单纯军事进攻转为政治攻势为主、军事进攻为辅，开始了解决西藏问题的新的努力。

从喀喇乌苏战败的康熙五十七年（1718）十月到护送灵童入藏坐床完成的康熙五十九年（1720）九月，清朝对西藏的行动，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康熙五十七年十月到五十八年正月，是清廷重新检讨并调整对藏策略阶段；五十八年正月到五十八年十二月，是对准部展开政治攻势和再次入藏的动员和组织阶段；五十九年正月到九月是两路大军入藏实施阶段。

第一阶段。大约在康熙五十七年（1718）十月上旬，清军败衄的消息传到北京，康熙帝震惊之余，并没有动摇解决西藏问题的决心。十月十二日，“命皇十四子固山贝子允禵为抚远大将军，统兵驻扎西宁”。[37]十一月十五日，进剿策妄阿喇布坦大兵起程。十二月十二日，抚远大将军允禵率兵起程。[38]康熙帝不为失败的情绪所困扰，连续发兵，是因为他充分认识到了解决西藏问题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自西宁至四川、云南，内外土番杂居一处。西藏之人，皆亲土番，伊等俱是一类，倘藏地被策凌敦多布占据，则藏兵即是彼之兵丁，而边疆土番，岂能保全！”[39]针对朝中部分大臣主张“看守”青海，康熙帝指出：“策凌敦多布领兵在藏，以我兵隔远，不能往救。朕思伊等兵步行一年有余，忍饥带馁，尚能到藏，我兵顾不能至乎？今满汉大臣咸谓不必进兵，朕意此时不进兵安藏，贼寇无所忌惮，或煽惑沿边诸番部，将作何处置耶？故朕特谕尔等，安藏大兵决宜前进”。[40]在当时的形势下，如果策妄巩固了在西藏的统治，新疆西藏联为一体，再加上

西藏作为黄教世界中心的影响和辐射力，对新归附清朝不久的青海将会产生很大的吸附力。康熙帝很清楚青海蒙古上层，特别是有着决定性影响的右翼首领始终与策妄集团及西藏上层有着说不清楚的关系。因此，从“安靖边圉”的高度出发，清朝必须逐出准噶尔，“以安各唐古特、蒙古之心”。[41]但是，另一方面，怎样实现这一目标，达到这一目的，却是康熙帝不得不妥为筹划、从长计议的问题。是年十二月，康熙帝得到了策旺诺尔布关于哈喇乌苏之战的详细奏报。针对议政王、大臣们急于求战“务于来年齐备力量，报此怨恨之心”的意见，明确表示反对：“朕意非如此”。并对前一时期急于进攻的战略进行检讨：“地高远，瘴气恶，粮饷难于运至之处，皆弃之不顾，惟为黄教，以刚勇之意而行，此又可称易乎？此显系事急而致”。并说“今不可急蹙，务应详慎尽心”。康熙帝提出了对藏的三条措施：第一、陈兵固守青藏交界地带。“令我大军自十一月撤至西宁等处，养马上膘，谨守哨堆，自诺木浑乌巴锡此方固守”。第二、对西藏实行全面封锁，静观其变。“暂禁西地所谓黄教，固守通往西地诸路，将茶、布、帕巾等物断绝，不到来年冬季即致混乱”。第三、最大限度地利用青海蒙古之力。“俟其败毁之时，惟用青海为黄教效力，即能成功，我等惟在后坐视”。[42]针对新疆的策妄阿喇布坦的准噶尔本部，康熙帝也主张围困固守为主。“于乌兰乌苏等要地设兵一队，建城池，四面较远处创设哨所以固守”，“自此内至巴里坤，沿途造堡，每堡驻扎兵丁四、五百人固守，大军照常驻扎巴里坤”，“故此，我军得以永固，坐视敌亡”。[43]康熙帝的意见当然地得到了满朝文武的赞同，并补充几点：其一、派人前往川藏交界的西康地区，防御车凌敦多布可能的进入。特别宣谕青海台吉，派人戍驻理塘、巴塘、柴达木、延达木、散达木、喀木等处，防备准军争夺其属民。其二、调集重兵威慑新疆和西藏准军：青海方面兵力 10000 人。新疆两路，傅尔丹指挥的阿尔泰一路为 23400 人；富宁安指挥的巴路坤一路拥兵 17252 人。三路统归大将军王允禵指挥，对外宣称“率兵二、三十万，即刻由三路进军，克招地展拓黄教”。其三、政治、经济手段同时使用，扰乱西藏内部。“宣扬新呼毕勒罕坐床，或暗遣喇嘛番子，于招地宣扬土伯特系数世承蒙圣恩之众，倘断我等边界经商之路，伊等稔知不可为生，向准噶尔车凌敦多布等反目，即剿杀，倘或将车凌敦多布等击败，于事甚益。”[44]

至此，清廷针对侵藏的准噶尔形成了新的战略指导方针：军事威慑、经济封锁，以促成西藏内部准藏反目；政治上打出展拓黄教、护送新呼毕勒罕坐床旗号，获得蒙藏民心，特别是借助青海蒙古之力。归结为一句话，即以政治攻势为主、军事攻势为辅。

第二阶段。主要是对准部展开政治攻势和争取青海蒙古支持。对准噶尔的政治攻势由一系列具体行动组成。首先向策妄阿喇布坦使者颁发谕旨并向车凌敦多布处遣使，一方面以事实谴责准军的不义行径，一方面侦察对方情况，收集相关情报。康熙五十八年（1719）正月，清朝利用准噶尔遣使清朝之机，向策妄的使臣颁发谕旨，对准军打着“弘扬不毁之教，安抚众生灵”旗号而行侵哈密、斩拉藏、毁寺庙行径严厉谴责，宣称“命我子大将军王率京城之满、蒙大军，遣往西宁，为黄教事会同青海人等议，弘扬黄教，拯救土伯特民，将其作为宗旨，伊等应行即行。”[45]同时安排对西藏策凌敦多布的遣使，使团以大将军王的名义派出，由允禵使者、新呼比勒罕使者、青海诸台吉使者（包括罗卜藏丹津、察罕丹津及贝勒、贝子、公等使者）组成。使者所携文书中除谴责准军在藏行径外，与准军商议有关宗教事务：“现塔尔寺有新呼毕勒罕，黄教大师达赖喇嘛班禅，班禅确实有无、或将何呼毕勒罕确定为达赖喇嘛、如何办理黄教、将教交付何人、或达赖喇嘛、班禅不论黄教寺庙之喇嘛等。”[46]进而提出“既有关宗教事大，所议宗教事务甚要，相约车凌敦多布于西坝之中间或何地，或而亲自前来会盟，议宗教，或我亲往会盟商议之处，务（必定夺）”。清朝方面的提议合情合理，但却给在藏的准噶尔当局提出一个大大的难题，既不能拒绝，也无法回避，更难以面对。允禵当仁不让地说：“军务事小，有关黄教、众生灵劳逸事大，（为宗教）之大事，既交派我，我必将保全黄教，普渡众生，我岂

不勤奋效力乎？”[47]大约在此前后，清廷另有两封致策妄阿喇布坦的敕书，基本重复上述论点，即："佛教乃全蒙古共奉之教"。清军前此入藏及此次满蒙大军前往西宁都是为与策凌敦多布及策妄阿喇布坦"会议道法"。[48]

清廷的这些主张，既揭露了入藏准军假"护法""卫教"、真扰藏"灭教"的面目，又争取了青海蒙古和西藏上层的支持，从而使未来的行动理直气壮，师出有名。

清朝的经济封锁和遣使进藏商议宗教二策均取得了预期的效果。来自西藏的情报说，准噶尔控制下的西藏地方政府已向策妄上书，要求将塔尔寺灵童请到招地。否则"三年内土伯特人并无余资，必将财尽库虚"。同时要求搞好与青海诸台吉及清朝的关系。由于"商上之财物均用尽，无供给准噶尔兵之廪饩"，不得不向各地强征赋税，而此举反过来更恶化了准藏关系。[49]允禵差往策凌敦多布处的使者功格色尔腾的"回奏"，从另一角度证实了清朝攻势的效果，其内容为：策凌敦多布对使者明白表示，对拉藏汗与青海蒙古及三大寺认定的两名呼毕勒罕都不能接受，故不可能择地会盟，也不敢与清为敌作战。在藏准军已穷困至极，"连病人计算，三千零二十二名，每人每月仅给银九钱，炒面一盘"。"所穿用者形甚窘迫，马匹牲口，瘠瘦者甚多"。这些人早已无心交战，大都声称"圣上为菩萨，若能拯兴黄教，拯救众生，则我等则已早回原处"等等。在藏僧俗人众都切盼从准军的控制下摆脱出来，被准军组织裹胁起来的土伯特兵早已无心作战。蒙藏僧俗民众，急盼大军早日入藏。尤其是听到小呼毕勒罕进藏坐床之事无不欢呼。[50]

其次，打出护送小灵童入藏坐床旗号，收拾蒙藏民心，从政治上孤立入藏准军。康熙五十八年（1719）春，允禵还在前往西宁的途中，康熙帝就指示他顺便前往谒见呼毕勒罕。[51]三月二十一日，允禵前往塔尔寺拜会格桑嘉措，表示将亲自护送进藏。[52]四月初，清廷同意格桑嘉措暂缓进藏的请求。九月，清廷代表胡毕图为首的使团自西藏返回，带回了准部在西藏的最新消息："策凌敦多卜等及土伯特众喇嘛民人，俱言在西宁现有新胡必尔汗实系达赖喇嘛之胡必尔汗。天朝圣主将新胡必尔汗安置在达赖喇嘛禅榻上座，广施法教，实与众人相望之意允协。且土伯特处时有瘴气，厄鲁特之子孙不能滋生，多生疾病，有何贪恋之处？惟恳天朝圣主将法教速为广施"。[53]这一信息透露出准噶尔已生退意，护送格桑嘉措入藏坐床时机已基本成熟。于是康熙帝决定："今将新胡必尔汗封为达赖喇嘛，给与册印，于明年青草发时，送往藏地，令登达赖喇嘛之座。"随后，清朝使者赴塔尔寺宣布："明年四月以内，由四大臣率大军护送入藏，于布达拉宫坐床"。[54]由清朝认定格桑嘉措为真正达赖转世，并将其送往西藏坐床，是青海蒙古王公多年来孜孜以求的。清廷此举极大调动了青海蒙古与清廷合作的积极性。十一月以罗卜藏丹津、察罕丹津为首的青海王公在西宁集会，请求清帝按册封五世达赖喇嘛那样册封格桑嘉措，于明年前往西藏布达拉宫坐床。[55]青海蒙古上层与清廷之间终于找到了共同点。

第三，尽一切努力争取青海蒙古的支持。青海蒙古上层在对待准军入藏、拥立格桑嘉措、与清朝合作等一系列问题上存在分歧，彼此不和已久。其中势力最大的是右翼的罗卜藏丹津和察罕丹津，他们敌视拉藏汗，对清朝也怀有戒心，却与准噶尔策妄阿喇布坦及策凌敦多布保持着密切联系。因此在清军第一次布置入藏时，他们非但不出兵协助，反而偷盗清军军马，"劫掠行抢"。但是，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青海蒙古对清朝西藏战略的成败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一则作为顾实汗的子孙，在拉藏汗死后，他们便是黄教道义上的护法者和传统施主，在恢复黄教道统上，他们较清朝更具有道义上的责任。二则，他们是新呼必尔罕格桑嘉措的拥立者，在护送后者进藏坐床问题上有着非同寻常的影响力。三则，青海蒙古王公与策妄阿喇布坦有姻亲关系。察罕丹津子敦多布汪扎勒曾议娶策妄阿喇布坦之女，策妄阿喇布坦之子噶尔丹车凌也曾向察罕丹津侄女达西拉布坦求婚。如果清军不能得到青海王公的真心支持，那么清军的任何行动对准噶尔来说都无密可保。因此，争取青海蒙古就成了允禵到青海后的一项重要任务。

康熙五十八（1719）年三月，允禵初到西宁，便"晓谕青海王、贝勒、贝子、公、台吉

等，将尔等所点派之兵皆于各自牧场准备，整修军用武器以待，视我调动即进兵。”[56]对于青海王公之间的互相讦告，允禵则以劝告调节为主，尽力弥合其裂隙。如对罗卜藏丹津遣使告察罕丹津勾结准噶尔一事，明确表示“尔等众台吉皆顾实汗之子孙、乃兄弟骨肉也”。“尔等众台吉，惟各自备兵以待，不准妄启衅端，大军进攻之时，我自有办理之处”。[57]对挑拨罗卜藏丹津和察罕丹津关系的贝子丹忠，则亲自“教诲”：“尔等若依我先前教谕之言遵行，断然无事，自然友好营生。”对察罕丹津的使者也面训“尔等内和睦相处为善”。[58]为了团结察罕丹津，允禵还在西宁亲自迎送察罕丹津奉祀的喇嘛果莽额尔德尼诺门汗并厚加赏赐。[59]康熙帝深知青海蒙古王公，特别是罗卜藏丹津和察罕丹津内心深处对西藏政治前途的冀望，不惜给予其政治上的允诺。还在康熙五十七年（1718）秋季察罕丹津赴京朝觐时，康熙帝就当面表示过“你回去约你们兄弟大力共征准噶尔贼，恢复你祖道法，令达赖喇嘛坐床。”[60]允禵到西宁后，继续打出顾实汗旗号，晓谕青海王公台吉等：“逆贼策旺喇布坦暗中遣兵，取招地，毁尔等祖父顾实汗所立之黄教，侵土伯特之众，斩尔等骨肉拉藏汗，掳掠妇孺。特命我大军管辖，保护尔等所有，清除逆贼，恢复尔等祖父顾实汗所立之黄教……以此尔等仰合皇父仁爱众生之至意，念尔等祖父顾实汗所立之黄教，各自整兵，忠诚效力，上天自然保佑，福至本身，并及子孙。世代坐享荣华富贵。”[61]应该注意到，此时清朝方面，虽一再标榜“恢复顾实汗所立之黄教”，却未明确表示由他们继承拉藏汗的政治地位。因此，在是年十一月出现了一件怪事：一方面罗卜藏丹津等上奏拥护清朝将新呼毕勒罕送往西藏坐床决定，另一方面，新呼毕勒罕却上奏表示：“各处俱有禅床，皆可安设。若为我兴兵、实关系众人”。[62]“故不要因我而起战事，使有情不安，特请求皇帝息兵，并请诸大臣使我愿望实现。”[63]格桑嘉措的这一态度令清朝疑惑不解，弄不清是格桑嘉措本人的意思还是青海王公的意思。“此或是新胡必尔汗之意，或是青海台吉等畏惧策旺阿喇布坦，密嘱新胡必尔汗奏，亦难预知。倘新胡必尔汗与青海台吉等意同，此新胡必尔汗不可送往。青海台吉等若无此意，必将新胡必尔汗送往，安设禅床，广施法教，令土伯特之众诚心归向，则策零敦多布自畏势逃遁。我师进藏定立法教之后，或留兵一二千暂行看守，或久住，则土伯特之众即如我兵……事关重大，不可急迫，从容周详定议为是。”[64]康熙帝的怀疑不无道理。其时格桑嘉措不过是一个十一岁幼童，很难相信具有对如此重大事务独立判断的能力。如果是青海台吉授意的，目的何在？是畏惧策旺阿喇布坦，还是以此为政治筹码向清朝索要未来西藏的政治利益？引人深思。此时清朝的进藏行动已箭在弦上，不可能取消。此种情势下清朝对青海蒙古作出进一步承诺是可能的。史料表明，清廷方面确实承诺过“克取土伯特部后，因自尔等内立汗”。[65]这无疑是青海上层梦寐以求的，但是，从当时的形势来分析，这只能是康熙帝的一种策略，而非其真实意图。康熙五十八年（1719）十二月二十三日，康熙帝关于三路大军西征有一道长篇谕旨值得玩味：“再，将青海之军，以朕意会同大军前我蒙古军效力，敌弱即击败，力强则汇集我大兵力剿杀。如此，则益于事。再，额驸阿保领兵，于队尾殿后，以防贼寇。抵达战场后，务于青海一处编前队为妥。倘青海之蒙古军将敌杀败取招地，如成功，即功也。以此我将军、大臣等将满洲兵按兵不动，以蒙古人等功成，我军徒在乎？若存此意，即为过也。功成乃全体功也。即青海兵前进效力，功成取招。伊等倘以土伯特部教俱我祖辈固始汗所建，地方俱属我者，仰赖圣主大军宏威，获取地方。主子自远方前来之军，为何辛劳驻扎守招。我军理应镇守，仅我军镇守可也，伊等欲镇守，则也妥。以此，我大臣等著军士略少驻守而已。如今朕已下此谕，后日以朕未谕而翻悔则断然不可，朕于众前颁谕也。若我大军抵达取招，此非平常之功，功大也”。[66]康熙帝的潜台词可以理解为如果是南路清军率先进占拉萨，则自然没有青海蒙古置喙的余地。日后的历史，果然是按照康熙帝的预期发展下去的。

第四，充分利用归服清朝的蒙古各部的宗教热情，对策妄阿喇布坦施加压力。现存满文档案中保存有两篇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致策妄

阿喇布坦的文书，显然是清廷授意，至少是经清廷同意的。一方面谴责准噶尔“无嫌隙为宗教起兵”的不义行为，另方面对其“至今不从不靠大皇帝仁化”表示遗憾，规劝其早日向清朝遣使谢罪。[67]清廷还发动内蒙古四十九旗扎萨克，外蒙古七旗喀尔喀汗、王、贝勒、贝子、公、札萨克诺颜致书策妄阿喇布坦，规劝其来降。特别是对准军在藏迫害黄教的种种恶行进行了有力抨击："尔不但毁坏古来之法度，且尔之所作所为，亦为闻所未闻，难以启齿。如此倒行逆施，毁弃誓约之罪，若系由尔而始，则需如实招认，以示谢罪西土则向博克达班禅额尔德尼请求，向我文殊师利皇帝祈祷，谢罪归降，则己罪消除，国之将存，亦未可料"。[68]总之，清廷通过广泛宣传准军在藏的不义行为，在整个蒙古黄教信徒中掀起了一场讨伐策妄阿喇布坦的舆论攻势，从而在政治上极大地孤立了准军，使策妄在道义上处于下风。为下一步的联合出兵入藏护教做好了准备。

第五，淡化军事色彩，突出和平旗号。清廷在对策妄阿喇布坦和策凌敦多布交涉中否认清军对藏行动的军事征战性质，称色楞、额伦特的入藏是“前往与尔之策凌敦多布及尔会议道法”[69]，“策凌敦多布等盗劫朕为法度而遣往说和之鄂伦泰、侍卫色棱等及其马畜，杀我兵丁，……”[70]。允禵统兵入藏的军事行动则称“再大将军王统领大军前往，与尔策凌敦多布会议政教事宜。”[71]这样一来，清廷方面就将自己置于和平与正义的化身这样一个有利位置上，迫使策妄阿喇布坦方面只能选择退出西藏。

第三阶段。清朝第二次进藏行动的组织实施阶段。康熙五十九年(1720)正月，命将。抚远大将军允禵率弘曙，移驻木鲁乌苏，管理进藏军务粮饷，授延信为平逆将军，率兵进藏，策旺诺尔布、阿琳宝、阿宝、常授、马见伯、李麟参赞军务。是年二月，组织南路军。授噶尔弼为定西将军，率领兵丁进藏，法喇驻守打箭炉。组织青海台吉会盟，确定出兵计划。清廷封格桑嘉措为“弘法觉众第六世达赖喇嘛”，由满汉官兵及青海之兵送往西藏，内、外蒙古，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方面派使者“会送”。是年三月，允禵亲自到塔尔寺，颁金册、金印及其他物品。

除了在将帅、兵员、粮草物资诸方面做了充分准备外，为了对付西藏的“瘴气”(实际是高海拔地区特有的高原反应及并发症)，康熙帝还准备了大批的药品发往西宁，其中包括“妙药十二斤八两，神符一万张，寻生救苦丹一千丸，保心石二万一千五百小丸，及装匣之六丸药、药方、药引子。”甚至还由道士制作了大批神符，指授了破除敌方巫术和瘟疫的方法。[72]

至此，清朝第二次入藏的准备工作全部结束，万事俱备。

康熙五十九年四月二十二日(1720年5月28日)北路军开始入藏行动。噶尔弼指挥的南路则稍早，于四月十六日(5月22日)自成都出发。南路兵行迅速，一路上除了归附者，没有遇到任何抵抗，于八月二十三日(9月24日)率先进入拉萨。北路行动则显迟缓。据清朝方面史料，曾与准军有过三次短暂接触。[73]但藏文史料说，在波合(卜克)地方遇准噶尔兵驻扎营地。“但未发生战事”。[74]九月十四日(10月15日)，北路军进入拉萨，新达赖喇嘛坐床。与此同时，清军组织的临时军政府开始运作，西藏的历史进入了一个新时期，即清朝直接统治的时期。

纵观康熙末年清军的两次入藏过程，可以明显地看到清廷在战略指导方针上有一个转变的过程。第一次选择了军事征战，结果却遭到惨败；第二次大打政治攻势，却出乎意料地顺利接管了西藏。西藏是一个宗教的世界，谁能赢得信徒的拥戴，谁就能赢得西藏。康熙帝以其丰富的政治经验敏锐地看到了这一点，“令土伯特之众诚心归向，则策凌敦多卜自畏势遁逃”，而争取西藏民心，离不开青海蒙古这个重要媒介。当然，康熙帝的这一正确认识，是以血的代价换来的。但他毕竟是认识到了西藏“以平靖教务为要事，军旅为小事”[75]这一独特之处，并以此为中心制订政策，终于取得了成功，这是他作为一个成熟政治家的过人之处。

---

①祁韵士《皇朝藩部要略》卷17，《西藏要略》1。道光十七年刊本。

②丹珠昂奔：《历辈达赖喇嘛与班禅额尔德尼年谱》，第200页。

③《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975页。

④《皇朝藩部要略》卷17，《西藏要略》第1页。

⑤《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 1006 页。

⑥《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 1014 —1015 页。

⑦《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 1064 页。

⑧《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 1092 页。

⑨章嘉 ·若贝多吉《七世达赖喇嘛传》第 31 页 ,蒲文成译 ,西藏人民出版社 ,1989 年。

⑩⑪⑫⑬⑭⑮⑯⑰《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 1152 页 ;第 1223 页 ;第 1210 页 ;第 1231 页 ;第 1229 页 ;第 1229 页 ;第 1230 页 ;第 1231 页。

⑱《清圣祖实录》卷 274 ,第 1 —2 页。

⑲《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 1260 页。

⑳《清圣祖实录》卷 274 ,第 20 —21 页。

㉑《清圣祖实录》卷 275 ,第 15 —16 页。

㉒㉓《清圣祖实录》卷 277 ,第 23 —24 页 ;第 26 —27 页。

㉔《清圣祖实录》卷 278 ,第 10 —13 页。

㉕《清圣祖实录》卷 279 ,第 7 —8 页。

㉖㉗㉘《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 1303 页。

㉙《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 1304 页。

㉚《清圣祖实录》卷 275 ,第 15 —16 页。

㉛《清圣祖实录》卷 274 ,第 20 —21 页。

㉜㉝《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 1526 页。

㉞《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 1656 页。

㉟《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 1658 页。

㊱《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 1356 页。

㊲张其勤 :《清代藏事辑要》,第 72 页。允禵原名胤祯满文档案中写为胤祯 ,《实录》等汉文史料则改为允禵。

㊳《清圣祖实录》卷 282 ,第 10 —11 页。《清代藏事辑要》记允禵出师为十二月六日(己酉) 。

㊴《清代藏事辑要》第 76 页。

㊵《清圣祖实录》卷 286 ,第 1 —6 页。

㊶《抚远大将军允禵奏稿》卷 5 ,页 14 下。

㊷㊸《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 1351 页。

㊹《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 1352 页。

㊺《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 1364 页。

㊻《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 1363 页。

㊼《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 1363 页。

㊽《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 1529 页。

㊾《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 1409 页。

㊿《抚远大将军允禵奏稿》卷 4 ,第 4 页。

(51)(52)《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 1371 页 ;1377 页。

(53)《清圣祖实录》卷 285 ,第 16 —18 页。

(54)(55)《历辈达赖喇嘛与班禅额尔德尼年谱》,第 209 页。

(56)《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 1379 页。

(57)(61)《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 1408 页。

(58)《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 1424、1438 页。

(59)《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 1419 页。

(60)《抚远大将军允禵奏稿》卷 16、第 2 页下。

(62)《清圣祖实录》卷 286 ,第 18 —19 页。

(63)《历辈达赖喇嘛与班禅额尔德尼年谱》,第 209 页。

(64)《清圣祖实录》卷 286 ,第 18 —19 页。

(65)《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 1523 页。

(66)《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 1442 页。

(67)(68)《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 1672 - 1674 页 ,第 1684 页。

(69)《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 1529 页。

(70)《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 1530 页。

(71)《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 1656 页。

(72)《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 1451、1454、1456、1458 页。

(73)《抚远大将军允禵奏稿》,卷 11 ,康熙五十九年十一月初四据延信禀报众藏众迎接大军等情折。

(74)《历辈达赖喇嘛与班禅额尔德尼年谱》,第 212 页。

(75)《抚远大将军奏折》卷 1 ,第 40 页下 ,日本东洋文库抄本。